

描摹中华文明最初的「容貌」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扫描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施雨岑) 2013 年秋天,浙江余姚井头村。一场台风带来的大暴雨后,两位放羊的老人在草丛中发现了奇怪的东西——贝壳和碎陶片。

“有贝壳不稀奇,有碎陶片也不稀奇,可是二者同时出现就很不寻常。”在国家文物局 24 日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回顾井头山遗址的发现过程时依然兴奋。

两位深具文物保护意识的老人,一个苦苦探寻沿海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古工作者,最终让深埋地下、距今 8300 年-7800 年的井头山遗址逐渐露出真容。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制品,海生贝壳和渔猎动物骨骼等动物遗存……大量出土的遗物,充分证明位于中华大地东部的沿海地区,在如此遥远的岁月里,已经有了一群向海而生的人。

相去不远处,便是家喻户晓的河姆渡遗址。而井头山遗址,早于河姆渡文化约 1000 年。

孙国平说:“主要依托广袤的内陆地区农耕文明繁衍发展起来的中国先民,几乎在同时抵达了东部沿海,适应海洋、开拓海洋,创造出了同样绚丽的海洋文明,两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远古华夏文明的完整底色。”

从海洋到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片土地的许多角落在史前时代便开始闪耀最初的文明星光。24 日的会议上,包括井头山遗址在内的 5 项重要考古成果让与会的专家学者十分兴奋。

若将中华文明视作一个人,那么考古工作的使命之一便是为其初始和早期的状态画像。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这幅画像,我们目前尚处勾勒轮廓的阶段。今天通报的这几项重要发现,为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提供了关键线索。”

在坝上高原,距今 8500 年-5200 年的河北康保兴隆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 7700 年左右的炭化黍,这是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一些进行了许多年考古工作、曾取得重大发现的遗址也有了新突破——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是确认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 1FJT3,面积近 8000 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发现 2 座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庭院和疑似廊庑遗迹,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复杂,应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这进一步提升了陶寺都邑的性质与内涵。

经过多年努力发现并确认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初步勾勒出距今 5900 年-3800 年间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其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赫赫有名的陕西石峁遗址曾苦于墓地被盗掘,文化面貌难以判断,而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和墓葬发掘的新进展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考古工作者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 20 余座,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 60 万平方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发现 21 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这些考古工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发展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宋新潮说。

据悉,国家文物局已印发相关文件,重点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将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剑阁古柏为何历经风雨挺立千载

敬畏·敬仰,当地“一树一策”把古柏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

新华社成都 9 月 29 日电(崔可欣、许春红) “长郁翠柏,斜阳照五津。景阳仍风雨,苍茫古栈云。”这是 1000 多年前唐代诗人李商隐笔下的蜀道胜景,诗中的“长郁”,指的是由近 8000 株苍翠古柏所环绕的剑门蜀道,世人又称其“翠云廊”。

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剑门关-翠云廊风景区”是国家 5A 级景区,这里的“皇柏大道”汇聚了“剑阁柏”等众多珍贵古柏。这些平均树龄有 1000 年的古柏树,为何能历经风雨挺立至今?

历朝重视:成就千载“翠柏天”

走在古柏林中,脚下是古老的青石板路,两旁翠柏高耸入云,夹道成廊,行走其间,心情怡然。

蜀道古柏的种植历史可追溯到北宋年间,历经后朝数次补植。遮天蔽日的古柏庇护下的金牛道,在古代连接着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秦川道,翠柏天,商旅兵家密如烟”是其繁盛时的写照。

“古蜀道上的‘皇柏’历代都设有专人管理,”剑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绍强介绍,蜀道植树目前可考时间为北宋天圣三年,主要目的是为修缮剑门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一线古蜀道栈阁提供用材。及至明、清、民国时期,历朝官府对古柏及驿道保护都作为重要日常工作来抓。

科学管护:“私人订制”式保护

2002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翠云廊古柏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2012 年后,保护区管理局挂牌成立,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我们对全县古柏进行了全面普查,登记每株古柏的 GPS 位置、树高、胸径、树龄、生长状



▲9月29日,在曲周县安寨镇前街村,演员为村民表演豫剧《铡美案》。今年8月以来,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组织开展“送戏下乡”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让广大农村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戏曲“大餐”。活动开展以来,曲周县已累计送戏下乡39场。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文化惠民 送戏下乡

旗袍遇上剪纸,传统文化遗产碰撞出新火花

一位位身着满绣旗袍的佳人形象出现在一幅幅精心创作的剪纸作品上。“旗袍遇上剪纸,两种传统文化的融合,两种美的碰撞,确实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曹保明说。

由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和沈阳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旗袍文化节剪纸作品展于近日在沈阳启幕。展览以旗袍元素为主要内容,以剪纸艺术为主要形式,共展出了近百幅作品。图案中既有身着传统旗袍的古典美女,又有身着现代旗袍的都市女性。

“用剪纸呈现布满图案的旗袍更显技艺精湛。”前来参观展览的沈阳市民李长智指着《盛京群芳图》说。

这幅《盛京群芳图》中,远处是沈阳故宫作大背景,而在故宫前,23位身着旗袍的佳人形象或站或坐,神态各异,更让人惊叹的是她们身上的旗袍风格,有的朴素端庄,有的华贵炫目,剪纸的高超技艺一目了然。

香港警察乐队：用音乐守护香港

都要进行测试。

对于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表演,李家宝说:“请拭目以待。”

香港警察乐队被称为香港最忙碌的乐队之一,最多时一年的演出超过 700 场。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演出暂停或取消,目前只完成了 100 多场演出。

“修例风波”期间,迫于面对的险恶环境,警察乐队被迫停止了工作,拿乐器的手开始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乐队队员们变成了抗疫专队队员,即使这些警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社会服务,但现在他们仍能感受到一些来自社会的误解甚至敌意。

用乐章沟通人心

在 3 万多香港警察中,警察乐队队员身份独特,他们是警察,却不持警棍和配枪,也不会去街头巡逻,而是手持乐器,用乐章沟通人心。

2017 年,有 157 份报名信息表送进了警察乐队的办公室,但最终仅留下 4 份。目前,所有队员都持有八级及以上音乐证书,其中超过四成队员有音乐专业文凭。

李家宝介绍,想加入乐队,必须符合香港警察的基本要求。报考银乐队需要精通至少一种指定乐器,如铜管乐器、木管乐器或者打击乐器,并持有权威音乐机构颁发的八级及以上证书,风笛队则需要至少一年的风笛队演出经验。

报考者通过乐器表演、体能测试、小组面试、心理评估、最后面试、基本法测试、品格审查

及体格检验后,才能正式成为香港警察乐队队员。

黎添铭 2003 年加入香港警察乐队,他擅长演奏萨克斯风和键琴。黎添铭喜欢一首叫《好日子》的歌曲,“萨克斯风能演奏出不一样的味道”。

他们在社区里为老人和孩子演奏,到学校和学生乐团合奏。2016 年至今,警察乐队走访了 69 所香港中小学及特殊学校,与约 27000 名师生互动。

警察乐队银乐队曾在九龙塘地区一个商场里快闪表演,市民们掏出手机争相和他们合影。警察乐队也是各种慈善音乐会上的常客,音乐会筹集的捐款被用来资助癌症儿童、特殊儿童教育等。

警察乐队队员何颂贤比黎添铭晚七年加入这支特别的队伍,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默契的工作伙伴。

何颂贤记得,2013 年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升旗仪式上,风雨交加,队员身上的制服被淋湿了,但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整场表演。

这也让何颂贤更加明白,香港警察应该是什么样。

鼓舞警队守护香港

二十几位乐队队员组成一个小组,在排练室内演奏着《狮子山下》《我和我的祖国》,每个人之间隔着一个约有两米高的透明易拉宝——这是疫情中的特殊安排,为的是防止

合体了：龙门石窟流散佛首实现「数字复位」

新华社郑州 9 月 28 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当 3D 打印技术遇到千年石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在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一件一比一 3D 打印复制的佛首造像顺利安放在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佛首和残像的断面完全吻合,实现了造像的准确复位。

此次合体的奉先寺等身立佛像是唐朝开元年间高力士等内侍宦官为唐玄宗祝寿所造。据龙门石窟研究院原所长温玉成推断,佛像原佛首应在 1923 年后遭盗凿,因为在一个日本摄影师 1923 年拍摄的奉先寺北壁图片中,这尊立佛造像头部尚存。

据了解,这件 3D 打印的唐代佛首造像原件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7 年,上海博物馆在北京购得这尊佛首,收藏于馆内。”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杨超杰说,“佛首面庞浑圆,眼部微鼓,具有典型的盛唐佛像造像特征。”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200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 世纪初,洛阳龙门石窟被大规模破坏、盗凿,大批石窟造像流散在外。

“数字化技术可以为文物修复、重建或鉴别来源提供更为精准、更为直接的参考依据。”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比如上海博物馆有 5 件馆藏文物来自龙门石窟,但具体属于什么位置并不清楚。去年 5 月,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李伯华,开始对这 5 件文物造像进行复位研究。其中一件高 40 厘米、宽 30 厘米的佛首,是第一个找到出处的文物。

“奉先寺头部缺损的等身立佛数量达到 40 余座,具体位置很难辨认。”杨超杰说。经过仔细观察,研究人员发现佛首后部断茬的横切面近“V 形”,根据这个特征,他们查看了奉先寺所有的等身立佛,发现北壁一个拱形大龛的三尊立佛居中者,能与之对应。随后,研究人员又依据三维数据,进行虚拟拼接后,确定佛首出自中间的立佛。

“通过高精度 3D 扫描和打印后,我们又对打印出的佛首表面肌理进行处理,根据文物本体色彩进行细致复原,安放后,佛首和残像的两个断面完全吻合。”杨超杰说。

除该佛首外,另外 4 件佛造像的位置也已基本确认。“这次合作研究,主要是想借助数字技术找到上海博物馆藏品在龙门石窟的准确位置,实现‘数字回归’,进一步充实龙门石窟资料的完整性。”杨超杰说。

“此次奉先寺佛首的‘数字复位’,为其他流失流散文物‘回家’提供新的可能。”史家珍说,目前他们已与国内外多所大学、博物馆建立合作,为更多龙门石窟流失流散文物寻找新的回家之路,实现“身首合一、复位归璧”。

“葫芦爷爷”的葫芦世界



▲刘振在家中进行创作(9月16日摄)。

71 岁的刘振居住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高新社区,因为常年使用葫芦进行创作,他被人亲切地称为“葫芦爷爷”。

2004 年,刘振在一次意外中脊柱受伤,之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待在家里。不甘寂寞的刘振尝试用烙铁在葫芦上进行创作,题材丰富多彩。如今,刘振已经创作了数千个葫芦,“葫芦爷爷”用葫芦创造了一个精彩的世界。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